

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

黎 泽 渝

先父黎锦熙先生（1890—1978）不仅在现代汉语语法、词典编纂和文字改革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建树。他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凡七十年，在长期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目录学与学术研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曾潜心于目录学的研究与实践，撰写出有关目录学的论著五十余种；在他主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工作的几十年间，一直把目录学定为学生的必修课，并曾亲自讲授“目录学”、“要籍目录”、“读书指导”等课程，指导学生读书、研究的门径，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专家和学者。

下面，我想就个人学习他的有关目录学的著作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以此表达我对先父的深切怀念。同时在目录学蓬勃发展的今天，回顾先父对目录学的贡献，也可以看到前辈们在创立现代目录学方面的艰苦历程，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果。

一、继承与革新现代目录学

中国的目录学，由来已久。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到刘歆时则“总括群籍，撮其指要，著为七略”^①。《别录》与《七略》，可视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我国传统的目录学起于读书指导，而读书指导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校雠，即就读书文字“辨其讹谬，”后世的书史、版本学、辨伪学，乃至校补、辑佚等均与此有关，都是图书本身的整理；二是将群书“部居流别”，或加“评论”，“论其指归”。由此可知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内容具有综合性，既包括校雠学、版本学、读书指导、图书管理学，也包括书评、学术史等。因此，先父认为这些内容虽有联系但毕竟性质不同，目标也异，只能看成是目录学“前站。”②

即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言，虽然这种分类法长期成为公、私藏书的图书管理依据，但早已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为学术界所不满。于是先父在1945年撰文提出建立“新目录学”。他认为目录学的核心就是分类，而其分类的标准则是学术系统。他一方面批评章学诚以校勘学统目录学，认为“是其考证不精之处”，一方面却肯定章学诚目录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认为这才是目录学的要害，可成为“目录学者的标语。”同时他还指出：“余之所谓‘新目录学’者，特不限于图书，而将推而广之于一切资料与事业耳”③。在他看来，新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古今中外的图书、资料、报刊资料、文献档案、方志等，同时还可应用于一切学术研究，乃至人们的工作、生活，即他所谓“将利用此种部类，可整理控制宇宙间之一切，不以图书为限。”这在当时无疑进一步强调了目录学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了目录学的应用范围，对发展现代目录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先父在三十年代初给学生开设目录学课程时，参照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编纂了《书目新答问》讲义④。张氏《书目答问》是中国目录学史的一部名著，先父对此书十分重视。但他认为这部以培养封建社会“通人”为宗旨的书，是不能适应现时学生需要的。这部书选目浩繁，学生读后对新旧群籍迷罔

玄惑，顶多只把它作为版本的工具书，起不到“分别条流，慎择约举”的作用。同时，在分类形式上，此书也过于陈旧。于是先父着手编撰《书目新答问》讲义。讲义充分体现了先父在建设目录学上的继承与革新精神：第一，改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打破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第二，保留了张氏已录书目，对张氏所著版本进行订补。同时酌补其未见者，后出者，特别是补充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科目中的新书，这样就使晚清以来西学东流的诸科书籍，在四部中无法归类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第三，对一些要籍酌加注释、按语或写出提要，使这部书目不只是单纯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发展情况，而且突出了指导学生读书研究的门径，使其发挥了更为实用的价值。

二、提出现代目录学的组织原则

关于新目录学的组织原则，先父高瞻远瞩，提出了“四化”的主张。^⑤即在图书分类法与部类的表现法上体现“世界化”、“现代化”、“科学化”与“工业化”。

所谓“世界化”，他认为世界各国的思想学术虽各有其独特系统，学术之玄属隆替虽异，其“名”与“器”实为公共的，因此在图书分类法上，类码表示法上，完全可以在国内乃至国外统一起来，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所谓“现代化”，先父认为世界各国虽独具各自的“国学”系统，但任何“国学”均属历史文献及民族文化性质，在学术大系上当可统一。因此，“一切部类，应准现代，不拘泥过去习惯”，可用现代的学术系统为标准，使一切古无今有或古有今无的书各得其所。

所谓“科学化”，先父强调的是现代的科学，即在图书分类上必须以科学分析的方法，以科学为权衡，进行严格分析，正确分配，这样就不难把各种图书合理地归入相应的部类中去。

所谓“工业化”，即采用数码法表示部类，提高检索效率。他说：“新目录学‘效率’之提高与扩大，其手段决不能以分类之合理化为满足，而必须用数码表示之。”这就是把工业化的基本概念——追求效率，运用于新目录学，强调类码法的重要性，以提高和扩大现代目录学的功效。

先父在四十年代提出把“四化”做为新目录学的组织原则，不仅观念新，而且立足点高。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在科技应用领域中谋求通用化、标准化、国际化，已大势所趋，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处理一切事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讲求效率更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努力方向。先父的这些基本思想，同今天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中所追求的目标是非常吻合的，实属可贵。

三、创建学术业务类码表

在传统的目录学中，以甲、乙、丙、丁的标码，来表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已不能满足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现代目录学必须以现代的科学系统为纲，对各种图书资料进行全面合理的分类。为此，先父在深入研究现代学术系统的基础上，借鉴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建了比较科学，比较实用的学术业务类码表，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改进。

先父于1943年首先拟定了《学术业务类码简表》^⑥，1947年又拟定了《学术业务类码详表》^⑦与《学术业务类码通表》^⑧。在这些类码表中，采用十进类码，按部、类、目三级来表示：首位表示部，共十部；二位表示类，每部下共十类，合计一百类；三位表示目，每类下共十目，合计一千目。把分到百类为止的类码表称《简表》，把分到千目为止的类码表称《详表》。所谓《通表》是根据需要和对某一学科的了解程度，综合简表与详表而成的一种比较灵活的类码表，即有些部分同简表，有些部分为详表，而且在详表的基础上还可再分细目一至三位数码，即在类码表的第三

位后加一个圆点，其后再有一至三位数码（先父于1946年创拟的《语文学大系》^⑨就属此类）。

例如在《类码表》中，第一位数码是“1”则表示哲学“部”，第二位数码是“2”，则表示中国哲学“类”，第三位数码是“1”，则表示先秦哲学“目”。把“部、类、目”综合起来，则“121”这个数码就用来表示哲学部的中国先秦哲学目。“目”下还可分细目，如“121.2”表示“儒家”，“121.3”表示“道家”，“121.21”表示“孔子”，“121.31”表示“老子”等。

解放后，先父根据我国学术研究的实际和学习原苏联的经验，不断修正充实类码表，于1952年11月发表了《新类码表》^⑩。

《新类码表》仍采用十进分类法，但明确标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斗争知识”等学术体系标目，具体“类”、“目”的内容也有修正。如哲学部中第一类为“马恩列斯著作”，第二类为“毛泽东思想著作”，这是原类码表中所没有的。后来，

于1955年先父又拟定了《三大部图书资料简明分类定序法》（简称《类码表》），并于1971年进一步修订，使《类码表》愈加适合时代的需要。1972年后，先父指导我及其他同志对家藏图书资料进行全面分类整理的过程中，对他的“类码表”又进行了修订。

为了推广应用《类码表》，先父还曾在《国语小报》发刊词^⑪中，提出并实施了新的新闻编排法，即把《国语小报》每期中的新闻逐条按内容分类编码，把每则新闻所属的类码与新闻标题同时印出并按固定的次序编排，还在报端列出每期的类码要目，便于读者找到所需的报导，而且对照前后各期又能看到某些重要新闻的连续报导，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如果有心积累某方面的资料，又可按类码进行搜集整理，这真可谓是事半功倍。

先父还曾把《类码法》用于地方志。1938年和1946年先后为《湖南省志和城故县志》编订出《地方志类码表》，这种类码表破除了章学诚方志学中的以文章体裁分类。即分为记、谱（图、表）、

考、传“四体”的陈规，而改用按文章内容分类编码，分为篇、目、项三级，并与学术业务类码相对照。这种志码表对于地方志的纂修提供了收集资料的方便。当今已故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在《方志学两种》^⑫序言中指出黎先生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概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是那么精湛；又有说服力，所以对于我国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仍有现实的参考意义。（书中所列篇目如卫生志、教育志、宗教志现在也很适用。）”

总之，先父认为类码表不仅适用于古今中外图书资料的统一整理，而且可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他曾指出：“我国学术以及‘官事’、‘民志’之待整理与策进，唯一而无疑的只有强调此类码法耳。”^⑬如文书文件的归档与调卷，办事手续与各种机关业务，均可用学术类码来支配，把管理工作与研究精神结合起来，做到科学化。又如在日常生活中，先父不仅在他所看过的图书、报刊、资料、文件上一一标上所属类码，甚至会议通知、贺片等也都标有类码。在他的居室中，书桌、书柜、书架上都贴有类码标签。这就是他说的：“一切皆支配以具体的学术类码，俾人人皆从宇宙大系中，自识其人生本位与生活途径。”

四、编制多种专科目录

先父在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广博精深的学术研究，内容涉及语音、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哲学、佛学、教育等学科。先父认为要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才能取得创造性的成果。因此他很注重搜集有关学术资料，并用类码法进行分类整理，研究某一专科学术的同时，也就编制出这一专科的目录。这种专科目录，不仅反映出学术发展概况，同时对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和指导学生们

进行学术研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

《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⑭ 先父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时和杨怀中（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人组织创办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当时主要编辑共和国的中、小学各科教材。次年他被教育部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兼文科主任，主持编审教科书。到二十年代，他曾把部里审定通过的教科书，著录成册，并在北师大、女师大任国语国文教学法和国文教材研究课程时，用做主要参考讲义。在长期编审教科书的过程中，他深感我国目录学缺少这部分书目，从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来看，他主张把“从元明的制艺起，举凡六百年间科举未废以前的八股、试帖、今义、策论诸选本和学校即兴以后的小学、中学各科教科书的儿童到青年的读物，都应该整编、收集成书目。”因为他认为这些书的“影响可以形成一代的社会风习、政治心理，是教育史上决不可少的材料。”《三十年来国文选本书目提要》正是实现了他的这个主张，书中收录了我国学校教育的早期课本和教材，对于我国教育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是一份珍贵而详实的材料。

全书集录了从清末光绪年间废除科举考试以来的廿七年间的国文选本，把这些选本按时间分成五个时期，对每个时期选本的特点都做了一个小结，对每部选本则著录了书名、编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册数、教学年级，同时概述了编制方法和内容特点，并评其得失。此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早期国文教材的历史发展概况，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语文教材发展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语音韵学研究纲目》^⑮ 先父从二十年代就很注重音韵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师大西迁，先父几十年的挚友钱玄同先生抱病不能随往，不久就病逝，原由钱先生担任的音韵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就由先父继续主持。正如现代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说的：“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振兴科学的音韵之学，在西南

之大师为罗常培、魏建功先生等；在西北全凭黎劭西师。”“劭西师为学以济世为先，以启迪后世为重，在音韵学方面尤为如此。不汲汲于个别专题考证，而乐于博采众家之长，揭示音韵全貌，以定大局，俾后学有所遵循。此盖劭西师所以为杰出学者又兼教育家而享盛名于世。”^⑩

先父在长期音韵学的教学与科研实践基础上，于1958年撰写出专题书目《汉语音韵学研究纲目》，该纲目对每部选目都著录了书名、作者、出版年月，概述其内容和体系特点，兼或略述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评其得失，并指导阅读方法。在选目和著录上打破了过去学院式的陈规，而注重古为今用及党对语言文字教育的方针政策。如把当时刚刚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研究音韵学的中心，再向纵的（历史渊源）和横的（方言调查）两方面扩展，用现代科学方法揭示了汉语音韵学的历史演变，较好地解决了古为今用的问题。在现代方言调查与分析中，此纲目注重汉语规范化问题，使音韵学、文字改革和方言三个不同学科的类目有机地结合起来。

此纲目在排列系统上采用数码标明该书所属的部、类、目，从而贯彻了先父的主张。而数码是采用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系统，使其所举的书目的分类力求标准化、统一化。同时还采用了“互注互见”的目录学原则，从而科学地揭示了音韵学纵横发展。此纲目又指明了阅读的先后缓急，必读与参阅的界限，这就更有利于指导读者治学的门径。

做为语文教育家的先父，在他一生中还编制过许多有关语文教育的专科学目和出版目录、个人著作目录等，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倡导索引工作

“‘索引’之为物也，能者不为，不能者不能为，然必为之而

后能者可以使人能，使人各取所需以尽所能，而其书之表里精粗、全体大用，亦可以相得而益彰者，则无疑也。（我希望以后中国一切书籍，都有‘能者’给它们制成索引。……做‘索引’工作者，可以说是给学者们延年益寿的。其福德不可思量！）”

这段话是先父1933年在他的力著《新著国语文法》“新序”中讲的。当时这部《新著国语文法》自192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以来，已出十版，风靡全国。他在此书序中为索引工作大造舆论，充分肯定索引工作的意义，极力赞美从事索引工作者，大声疾呼，一切书籍都应制索引，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动手。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国语运动史纲》、《比较文法》等著作中，做了多种形式的详细索引，这在三十年代的我国语言学术界也属首创，对我国索引工作的发展，无疑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检字法是直接关系索引编制工作的。早在1917年，先父就撰文提出改良字典部首^⑦，后又领导大辞典编纂处专门收集、会萃了全国各方面对检字法的意见，并对二百五十万张资料卡片进行了多种方法的整理编索。在大量实践基础上他认为：（一）旧部首索引极不易掌握，其原因是一个字的上下、左右、内外都可能存在部首，即部首在一个字中没有一定的位置。他针对此问题于1935年提出了四系七起笔一百二十部的“汉字新部首”。（二）他认为音序检字法是最为简捷的，应积极推广^⑧。于是他在三十年代领导编纂的《国音字典》、《国音常用字汇》中，首次采用了音序检字法，因而在我国词典编辑史上是个创举；并且这两部字典又被当时教育部颁定为全国读音标准而推行。这对于普及推广音序检字法起了促进作用。这两部字典还附了先父的新部首检字法索引，这对全国部首检字法的改良也起了积极推进作用。

解放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汉字检字法研讨，先父把他1935年的旧方案进一步调整、精简，吸取了旧部首制、画数制的优点，结合笔形系统、起笔位置，设计出部首位置绝对化的“汉

字新部首”^⑩，他为今天汉字编码机器翻译的创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六、参与解放后目录学的研究

解放后，先父非常关心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建设，曾多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图书分类法研究讨论，发表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得到采纳。

1952年先父撰文对杜定友先生的“人民图书分类表”提出几点修正意见^⑪：一是认为，杜表把语文、文艺合为一大类，放在“文教艺术”标目之下，是不妥当的，因为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把语文与艺术合而为一，终有混同之嫌；标目为“文教艺术”，“语文”不在其列，这样在体系上“语文”没有交代。他认为：“语文”当从“文教”中独立出来，单设“语文文献类”。二是认为，文艺作品虽多，但独占一大类似乎失去平衡。三是认为，在十大类的次序上，当把文教、文艺类移到自然科学大类之后，使之与政治、财经类与社会史类相近。

杜定友先生接受了先父的意见，杜在《关于人民图书分类表的修正》^⑫一文中说：“黎锦熙同志对于我表的修正，帮助我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表把‘文教艺术类’，排列在‘社会史地’和‘财经政法’类中间，是最不妥当的。……黎表（黎同志对我表的修正表）把它移到科技之后，是很合乎实际的，我想全国图书馆界，无不一致拥护的。”又说“黎同志所提出的两点意见，我完全同意。尤其是语文文献部的创立，更为钦佩。……黎表把语文文献合为一部，接近文艺和总类，与字典辞典相近，最为恰当。以语文文献作为文化交流工具，尤有见地。”

1955年又提出了《三大部图书资料简明分类定序法》，即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部及下属十七大类的分类法，对全国图书分类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先父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教授目录学到提出新目录学的组织原则，从创建类码表到亲自编撰各种学术专科目录，从不断改进、充实自创的类码表到提出三大部十七大类的现代图书分类法，从力倡编制索引到深入研究汉字检字法，可以看到前辈们在建设现代目录学方面的艰难历程，反映了前辈学者批判、继承、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勤于实践，精益求精的风范。先父的目录学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他的某些目录学的基本观念，已成为现代目录学的基础理论，他对图书资料分类法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已被目录学界所采纳，他亲自编纂的许多学术专科目录至今仍有学术价值。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认真总结，继承、发扬。

注：

①《隋书·经籍志》。

②③⑤⑬黎锦熙《论中国目录学之演进及新目录学之要义》1947年湖南大学《文院集刊》第一期。

④黎锦熙《书目新答问》，1935年至1940年油印讲义。

⑥黎锦熙《学术业务类码简表》1945年12月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三期合刊。

⑦黎锦熙《学术业务类码详表》，1947年长沙益智学术研究所出版。

⑧黎锦熙《学术业务类码通表》，1947年7月完稿，全四册，未出版。

⑨黎锦熙《语文学大系》，1946年兰州《国语周刊》第60期。

⑩⑳黎锦熙《新类码表》，1952年11月《浙江图书通讯》三卷七期。

⑪《国语小报》，1947年创刊号。

⑫《方志学两种》，路志霄编，1983年长沙岳麓书社出版。

⑭黎锦熙《卅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1933年《师大月刊》第二期，文学院专号。

⑮黎锦熙《汉语音韵学研究纲目》，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

⑯1984年，张清常先生审定《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黎锦熙著黎泽

渝编，未出版）一书音韵学部分时所写。

⑰黎锦熙《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1919年收入《国语学讲义》（商务印书馆出版）。

⑱黎锦熙《四十多年来创拟汉字新部首的回忆》，1961年《文字改革》8~9期。

⑲黎锦熙《“汉字新部首”拟案（举例）》，1961年8月15日《文汇报》。

⑳杜定友《关于人民图书分类表的修正》，1952年11月《浙江图书通讯》三卷七期。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

明戏曲家谢弘仪佚诗

明代戏曲家谢弘仪著有《蝴蝶梦》传奇二卷四十齣，搬演庄周梦蝶的故事。今有明崇祯间挂笏斋刻本及《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说：“谢弘仪，一名国，字简之，号寤云。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以中丞出镇粤东，多所建树。约明万历中前后在世。”康熙《会稽县志》说：“谢国，武甲，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谢弘仪状元。”均不详谢弘仪有诗文集。

明佚名《福庐灵岩志》卷三《诗》收有谢弘仪和徐渤的纪游诗。明福州徐渤《红雨楼书目·传奇类》收有“《蝴蝶梦记》，谢弘义（仪）”看来，谢弘仪和徐渤可能是相识的。福庐山为福州府福清县名山。

谢弘仪的两首佚诗是《夏日游福庐山得五歌》：

一壑烟云荫薜萝，乱峰遥对郁嵯峨。洞迷旧路逢僧引，松偃新阴待鹤过。碧沼水喧分溜远，翠微人语倚栏多。余家亦有登山屐，壮不攀跻老去何。

西子乌能老苧萝，鬢鬟才洗碧峨峨。万年混沌谁为剖，此日招寻我亦过。泉绕槛边浇竹近，洞悬峰杪贮云多。山灵有待施膏沐，憎爱从来竟若何。

按：诗当有五首，然《福庐灵岩志》只刊刻两首。

• 官桂铨 •